

试论二战后盟国处理 在德犹太难民问题得失

卢彦名

内容提要 二战结束后,面临严峻而棘手的在德犹太难民问题,盟国当局试图寻找各种方法加以妥善解决。由于盟国各方利益与立场的差异,其对待在德犹太难民的政策一直处于博弈和不断调适的过程之中。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和以色列的建国对犹太难民问题的解决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德国犹太社团的重建也在如此错综复杂的环境中进行着。

关键词 大屠杀 犹太人 盟国 幸存者 难民

众所周知,惨绝人寰的纳粹大屠杀给犹太民族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创伤。超过 600 万欧洲犹太人在这场浩劫中丧生。对于通过各种途径得以幸存到战后的犹太人来说,颠沛流离的难民生活就成了战后一段时间生活的基调。摆在盟军面前的问题是错综复杂的。今天,我们回顾盟国处理在德犹太难民的过程,或许能够重新发现许多已经渐已被世人淡忘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犹太幸存者与犹太难民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中欧大地,哀鸿遍野。美国军官索尔·帕多佛(Saul Padover)这样描述当时的惨象:“成千上万的、最终有数百万被解放的奴隶从农场、工厂、矿山涌向大路。……他们都在那里,除了犹太人。六百万犹太人,包括老弱妇孺已经在焚尸炉里化为灰烬、在藏尸房中化为白骨。”^①实际上,就德国本身的情况来讲,帕多

佛的描述并非完全准确。1933 年纳粹上台执政时,德国约有 5 万名犹太人;战前已经有约 30 万德国犹太人通过各种途径离开了这个国家。留在德国的犹太人中大约有 1 万 5 千名德国犹太人在纳粹大屠杀中幸存下来。这 1 万 5 千人约有一半滞留在柏林。^②一些人是以伪装成“雅利安人”身份而得以在大屠杀中幸存,其他人则是死亡集中营或劳动集中营的幸存者。年迈的幸存者通常都是来自特莱希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集中营。此外,战后初期还有一些德国裔犹太侨民回到德国,主要是给盟军充当翻译、检察官、文秘等。

这里有两个有着重要差别需要适当厘清的概念。首先是“幸存者”。“幸存者”一词通行意涵是指那些在纳粹占领区的特定艰苦条件下遭受长期苦难并得以生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犹太人;这不包括那些生活在中立国或纳粹卫星国的犹太人,也不包括那些战时在纳粹占领区以外遭

受苦难的犹太人。

另一个术语是“难民”。在战后,国际上以“流离失所者”(DP)一词代指包括犹太幸存者在内的东欧难民,其总人数在1100万到2000万之间。除犹太人外,大部分难民只是暂时性的逃亡,随着时局稳定,他们中大多数人很快就回到故乡或迁居他处。战后,在德犹太人的主体是东欧犹太人,他们被盟军当局划归为“流离失所者”。盟军从纳粹各集中营解放了大约9万名犹太难民。再加上战后初期涌入德国的东欧犹太难民,1945年到1948年之间,仅在德国的美英占领区的难民营中就有20余万欧洲犹太难民。在德国东部地区,苏联占领当局坚持按照出生地对大屠杀幸存者进行分类,因此,他们并没有允许在德国东部为犹太难民建立单独的营地。1946年1月,苏联军队奉命清空苏联占领区内的波兰犹太人安置点并关闭这些临时营地。到1946年底,在德国苏占区内的犹太人约有1200-1500人,另有2442名犹太人居住在东柏林。相对于德国西部来说,苏占区的犹太幸存者处于较为分散的状态,人数也有限。

此外,德国境内东欧犹太难民人数一度大大超过了德国本土犹太幸存者的人数,因而“在德犹太人”和“德国犹太人”成了两个不同的概念。这同时也意味着,战后初期在德犹太社群无法按照纳粹上台之前德国犹太社群的既有模式进行重建,这就是摆在盟国当局面前的现状。

盟国的初期应对策略及其弊端

犹太难民问题比其它任何难民问题都更加错综复杂。它涉及到盟军的占领政策(从去纳粹化转向冷战)、西德的合作重建,英国对巴勒斯坦地区的政策、美国犹太社团的压力和美国的移民政策、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国家的诉求、苏联和东欧新兴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联合国的托管与国际救援组织的活动等等,可谓是千头万绪。

为了应对犹太难民问题,1945年4月,美占区率先与联合国难民署(UNRRA)以及美国联合分配委员会(JDC)展开合作。盟军将一些纳粹集中营(例如著名的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改造为临时的难民营,提供人道主义救济。此外,盟军还

将战时德国的一些军营以及其它设施改造成为难民营。在德国境内,盟军当局为“流离失所者”建立了共计35座难民营。^③

与此同时,德国本土犹太幸存者的境况则与德国境内东欧犹太难民的境况有很大的不同。由于德国本土犹太幸存者大多居住在城市,因此盟军当局并未设立特殊的机构接纳他们。更有甚者,最初他们是被作为战败国国民对待的。英占区副司令长官罗纳德·韦克斯(Ronald Weeks)将军为这一政策辩护道:“如果我们因为犹太人的遭遇而把他们排除在外,那么任何其它受过纳粹迫害的德国人也可以依此逻辑而被排除在外了。”^④这就意味着,德国犹太人是被当成一般德国人对待的,他们与他们之前的迫害者一样领取较低的食物配给。国际红十字会无法给德国犹太人或者德国籍的政治难民直接寄送食物包裹,仅仅因为他们是德国人。这导致了英占区德国犹太人代表诺尔伯特·沃尔海姆(Norbert Wollheim)等犹太人领袖只能依靠德国民政当局,后者以德国配给标准提供住所和食品。对于历经多年集中营折磨、亟需特殊护理的人来说,这些是远远不够的。

对于国际犹太组织访问的要求,英占区当局反应则相当冷淡:“我们肯定无法照料那些想来这里访问然后回家做有趣报告的人。”与此同时,盟军当局还拒绝了这些国际犹太组织提出的将犹太难民从其他难民中分离出来予以特殊照顾的要求。罗纳德·韦克斯(Ronald Weeks)将军直言不讳地对世界犹太人大会英国分会的主席雷丁侯爵说,将犹太人从难民中分离出来可能会导致那些不同国籍的“拒绝遣返并持续制造麻烦”的犹太人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他认为,“政策应该继续强调政治国籍而非种族和宗教归属”。1945年9月中旬,在一封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中,英国首相艾德礼警告说,将犹太难民单独区分开来可能导致其它难民的暴力行动。^⑤

在德犹太人对德国人的不满情绪也得到了盟军占领当局官方记录的印证。英国官员乔治·伦德尔(George Rendel)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犹太难民尤其憎恶被与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驱逐出来的德国人圈禁在一起,“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与过去迫害他们的人同处一室,接受与被打败的敌

人同样的待遇。”^⑥

由此可见,人为地将德国犹太幸存者与其他在德犹太难民区隔离开并给予不同待遇,这是战后初期盟军难民政策的一大弊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魏兹曼曾指出:“当未来的历史学家汇集我们这个时代的悲惨记载时,有两件事他们会认为是难以置信的:一件是罪行本身,其次是世界对这一罪行的反应。”^⑦

盟国犹太难民政策的调整

起初,盟军的占领当局曾预计犹太难民会与其它难民一样很快返回自己出生的地区。但是很快盟军占领当局就发现必须调整其对犹太难民的政策,压力首先是来自难民营之外。世界犹太人大会(WJC)要求派遣代表团考察难民营,并要求增加其志愿者人数。英国犹太人代表委员会(BDBJ)则抗议某些难民营中犹太难民的食物配给量还不如德国人获得的食物配给量。该委员会还提议占领军从难民中招收犹太人参与对德国的军管。^⑧

迫于舆论压力,1945年7月盟军占领当局做出决定,从集中营解放出来的敌国国民将被视作盟国国民对待并与其他国际难民共同安置。^⑨进入1945年秋天之后,盟军对犹太难民的管制大为放松。同时,随着国际救援物资的大批到来,难民营的气氛开始活跃了起来。

盟军的这一政策的间接影响之一就是战后数年间大屠杀幸存者婚姻数量和新生儿出生率的直线上升。1946年3月,柏林犹太委员会的半官方报刊《道路》(Der Weg)第一期撰文称,根据2月的统计,柏林地区7768名幸存者中绝大部分是孑然一身且“处于无尽的孤寂之中”。^⑩同时,饱受苦难压抑之后,人之为人的性属性在难民营被再次发现了。“在绝望中结婚生育”,以生育报复纳粹当年的暴行,这成了难民营的共识之一。到1946年7月,“难民营中18-45岁的妇女有三分之一要么正怀孕,要么已经生产。”^⑪难民营人均每天2500卡路里以上(纳粹时代集中营人均每天不足100卡路里)的热量摄入、较之先前有天壤之别的医疗、住房条件,都使得犹太幸存者之前备受压抑的生育冲动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家庭和子女加强了犹太难民之间的情感纽带,为大屠杀幸存者日

后恢复正常的生活奠定了基础。

随着局势的稳定,盟军占领当局开始着手将纳粹没收的犹太人财产物归原主,但仅限于财产本身,当时赔偿还没延伸到从肉体和精神上遭受纳粹迫害的受害人。1947年美国实行的一项军管法规定,这些财产或物归原主,或给予被掠夺者相应补偿,该法日后成为德国联邦政府制定一系列赔偿法的指导性原则。

盟国犹太难民政策中的国际政治因素

对于相当一部分已经离开德国的犹太人来说,战争结束时德国俨然就是死亡的国度,德国人-犹太人“共生”的时代似乎已经彻底结束了。1946年,远在巴勒斯坦的记者罗伯特·韦尔奇(Robert Weltsch)最早将这一沉默的禁忌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声音:“我们不能想象还有犹太人会留恋德国。这里充满了尸体、毒气室和酷刑室的气息。……剩余的犹太居民应当尽快离开。德国不是犹太人生活的地方。”^⑫

应当说,这样的论断并非毫无依据。用赫尔贝尔特(Ulrich Herbert)的话来讲:纳粹时代导致了“德国人道德的深刻残忍化”。^⑬专制的权力还在奴役人的自由,洗脑的语言还在控制人的思想。1946年4月27日,正当犹太难民集会纪念华沙隔都起义三周年之际,纽伦堡当地的一些德国人却在用“用啤酒和歌声”欢迎当地二战德军战俘的归来。这最终导致了双方的严重肢体冲突。^⑭确实,对于很多纳粹大屠杀幸存者而言,继续生活在这块曾给他们带来无穷苦难的土地上不啻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

战后初期,德国境内犹太难民的海外移民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态。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英占区的情况。战后初期,英国不仅是德国的四大占领国之一,还维持着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因此在处理犹太难民的问题上英国的政策是较为保守的。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中东对于英国都是至关重要的。为了捍卫自身的利益,同时为了抵御苏联势力的扩张,英国不得不倚重阿拉伯国家,而犹太难民的移民要求则被英国当局断然拒绝。1946年,英国外相恩斯特·贝文(Ernest Bevin)这样描述当时的英占区难民营的情形:“一个恶性循环就此形成。到(德国)西部的难民越多,

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非法移民的活动就越猖獗;抵达巴勒斯坦的非法移民越多,国王陛下的政府就越需要采取措施防范移民潮破坏协议解决问题的机会;这些措施越严厉,欧洲难民营里累积的难民数量就越大。”^⑮

与英国政府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政府的政策转变。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暴行,不仅把大多数犹太人团结在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周围,也赢得了美国民众的同情和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美国迅猛发展的同时,美国在中东也开始全面卷入,这两个因素都使得美国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越来越带有官方色彩。1946年4月底,杜鲁门利用英美委员会报告的发布之机发表声明,强调了解决犹太难民问题的重要性。“我很高兴我提出的立即允许10万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的要求已得到英美调查委员会的一致认可……我同样高兴的是,委员会实际上建议废除1939年白皮书,包括现在对移民和土地占有的限制,以便能进一步发展犹太民族之家。”^⑯

美英当局在犹太难民问题上的分歧原来越大,通过一件事就可见一斑。1946年7月4日,波兰城市凯尔采发生反犹暴动,80多人遇害,这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最大规模的屠犹事件。波兰发生的新一轮反犹事件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新一轮的东欧犹太难民潮。1946年七八月间,平均每天有250名波兰难民进入英占区。英国占领当局拒绝了美国方面多次提出的重新安置这些难民的请求,转而要求难民营的犹太管理者从既定的食物配给中自行划拨口粮给这些所谓的“渗透者”。美国占领当局对此表示相当不满。^⑰

难民营内与营外

难民营的围栏无疑会勾起大屠杀幸存者对纳粹集中营生活的痛苦回忆,这道围栏也成了战后在德犹太人与德国社会之间精神上的分水岭。有人曾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我的世界分成两个部分,生活在难民营外的人和生活在难民营内的人。难民营外面是敌人。”^⑱不过,这样说的人显然遗忘了一个事实,就是在难民营外也有犹太人生活。随着时局的安定,难民营内外的大屠杀幸存者开始建立起各种联系。

德国犹太社团的重建就在如此错综复杂的环

境中进行着。1943年,纳粹解散了境内所有的犹太组织,此后德国犹太人便一直处于没有社团领导的状态。1946年9月,“被解放犹太人中央委员会”在美占区率先成立。这个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战后德国犹太社团重建工作的步入正轨。1947年7月,在英占区召开了“被解放犹太人大会”,会后成立了“英占区犹太社团委员会”。1950年7月,两大西德犹太人组织最终合并,成立“在德犹太人中央委员会”。从此,西德犹太社群恢复了存在。与此同时,尽管遇到了诸多困难,苏占区也开始了犹太社团的重建工作。虽然没有成立统一的组织机构,但各地的一些犹太社团还是陆续在恢复之中。^⑲

与社团一起恢复的还有正常的宗教活动。对于许多经历过大屠杀浩劫的幸存者来讲,逃避身为犹太人的命运是不可能的。坦然接受命运,已经成为每一个犹太人的道德责任。早在1945年4月30日,随英军一起解放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正统派拉比赫尔曼·霍尔夫哥特(Herman Holf-gott)就开始着手恢复犹太教传统。1947年,英占区各犹太教正统派团体达成协议,共同推举霍尔夫哥特为英占区首席大拉比,这一决定很快得到了英军占领当局的承认。^⑳1945年10月,美占区的拉比委员会在弗伦瓦尔德(Föhrenwald)建立了第一座犹太宗教学校,美占区各难民营犹太宗教学校学生总人数一度达到3000人。1946年3月,英占区已经有5500人可以吃到严格符合犹太教饮食律法的肉食。^㉑

尽管大屠杀幸存者构成了德国社会极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最初他们并未作为一个特定群体自我组织起来。他们没有组建政党,他们的领导者并没有取得显赫的政治地位。犹太幸存者在盟军当局针对纳粹战犯的纽伦堡审判以及之后一系列司法诉讼中也没有扮演50年代之后那样的活跃角色。这些状况或许是由于在德犹太人是来自各国和持有各种政见的犹太人组成的一个异质的群体。另一方面,在进入政治生活之前,他们不得不从战时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并重新获得力量和信心。因此,在这一阶段他们是作为个人而非群体开始融入德国社会。

尾 声

最终,盟军占领当局逐步全面开始放开犹太

难民的离境。虽然从战争一结束德国境内的犹太难民就开始大批移民以色列和北美,但移民的最高潮是在1947年之后。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投票通过巴勒斯坦分治方案。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宣告成立。这在德国的犹太难民中立刻激起了巨大的反响。一位名叫汉娜·摩登斯坦(Hannah Modenstein)的难民这样回忆她对以色列独立宣言的反应“我们都站在难民营的中心,唱着《希望之歌》(以色列国歌)。那真是棒极了。我们非常自豪,感觉我们有了依托。我们和其它民族一样了。……(以色列国的成立)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这毫无疑问。”^②短短几周之内,有70%以上的犹太难民登记申请移民以色列。

此时,只有美国允许难民前往以色列。英国起先拒绝承认以色列国,从5月到11月,移民活动在英占区一直被禁止。随着以色列国的成立,移民活动一浪高过一浪,英占区终于也作出最后的让步,全面放开移民。从1948年7月1日到1949年6月30日这一年时间内,共有86 356人离开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前往以色列(其中53 388人离开德国),加上先期被拘留在塞浦路斯的1万余名非法移民的获释,此时犹太难民移民以色列已经是不可阻挡的大潮。而在同一时间内,移民美国的欧洲犹太难民只有15 322人,前往加拿大的有6000人,前往澳大利亚的有2287人,还有10 325人前往其它国家。^③

据估算,大约有1万名犹太难民和另外1万名德国犹太人选择了留在德国。到1960年,在德犹太人已经恢复到28 000人左右。^④对于许多犹太人来说,选择留下和回归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德国犹太人经常不适应异国他乡的生活环境。如同大多数在德犹太难民移民海外是由于难民营艰苦的生活条件一样,一部分犹太人回归德国也主要是看到德国战后重建进程的顺利开展和经济形势的迅速好转。由于马歇尔计划的强力支持,到1950年,成立刚满一年的联邦德国的经济已经基本恢复到战前德国的水平。这一年,在德犹太社群也渐趋稳定,止住了下滑的趋势,犹太人的社会经济生活开始步入正轨。

到1951年,整个西德只有弗伦瓦尔德这一座难民营还在运营。盟军占领当局将这座难民营交给联邦德国政府管理。最终,弗伦瓦尔德难民营于1957年关闭,结束了德国境内存在难民的时代。^⑤

- ①Saul K. Padover, *Experiment in Germany*, New York, 1946, p. 343
- ②⑩⑭Atina Grossmann, *Jews, Germans, and Allies*, Princeton, 2007, p. 1, p. 95, p. 225
- ③Yehuda Bauer, *Out of the Ashes*, Oxford, 1989, pp. 45 - 60.
- ④Public Record Office, Foreign Office 1052/281, Grasett to Boven-schen, 26 June 1945.
- ⑤⑥⑧⑬⑰Arieh J. Kochavi, *Post - Holocaust Politics: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 Jewish Refugees, 1945 - 1948*, London, 2004, p. 36, p. 45, p. 33, x, p. 51.
- ⑦[美]沃尔特·拉克《犹太复国主义史》,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第670页。
- ⑨⑱Jay H. Geller, *Jews in Post Holocaust Germany, 1945 - 1953*, Cambridge, 2005, p. 22, pp. 54 - 66.
- ⑪Michael Berenbaum, *The Holocaust and History*, Indianapolis, 1998, p. 188.
- ⑫Monika Richarz, “Juden in der BRD und in der DDR seit 1945”, *Jüdisches Leben in Deutschland seit 1945*, Frankfurt, 1988, p. 14.
- ⑬Robert Gellately, *Backing Hitler Consent and Coercion in Nazi Germany*, Oxford, 2001, p. 262.
- ⑯FRUS, 1946, Vol. VII. pp. 588 - 589.
- ⑰Bert Lewyn, *On the Run in Nazi Berlin, Holocaust Memoire*, Xlibris, 2001, p. 315.
- ⑳㉑㉒Margaret Feinstein, *Holocaust Survivors in Postwar Germany, 1945 - 1957*, Los Angeles, 2010, p. 205, p. 217, p. 289.
- ㉓Jacques Verant, *The Refugee in the Post - War World*, New Heaven, 1953, p. 65.
- ㉔[英]马丁·吉尔伯特《犹太史图录》,徐新、孔德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0页。

作者简介:卢彦名,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系犹太思想与文化专业博士后。南京,210093

(责任编辑:吴 明)